

鲜花 献给您

——我们的养父
路易·艾黎和乔治·何克



聂广淳 聂广涛 聂广沛 聂广洪 著

聂亮亮 聂广涵 主编

中国和平出版社

鲜花献给您

——我们的养父路易·艾黎和乔治·何克

聂广淳 聂广涛 聂广沛 聂广洪 著

聂亮亮 聂广涵 主编

中国和平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鲜花献给您:我们的养父路易·艾黎和乔治·何克/
聂广淳等著;聂亮亮主编. —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
2007.9

ISBN 978-7-80201-649-1

I. 鲜… II. ①聂… ②聂…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1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137163号

鲜花献给您

——我们的养父路易·艾黎和乔治·何克
聂广淳 聂广涛 聂广沛 聂广洪 著
聂亮亮 聂广涵 主编

责任编辑:庞 旻

特约文编:李雪英

特约美编:唐 诤 吕芳芳

责任校对:王秀玲 邸 洁 陈海鸥

责任印制:王 红 宋小仓

出版发行:中国和平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鼓楼西大街154号(100009)

发行部:(010)84026161 84026019

网 址:www.hpbook.com

E-mail:hpbook@hpbook.com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 张:12

版 次:2007年9月第1版 2007年9月第1次印刷

(版权所有 侵犯必究)

ISBN 978-7-80201-649-1/K·029

定价:18.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1960年艾黎（右一）和斯诺（左一）在毛泽东主席家里做客。



1970年周恩来总理与艾黎在北京体育馆里交谈。



1977年邓小平同志出席祝贺艾黎80寿辰宴会。



1977年艾黎80岁生日时，宋庆龄设家宴为他祝寿。



新西兰总理戴维·朗伊在北京与中新友谊的架桥人艾黎高兴会面。



1982年，对外友协名誉会长邓颖超祝贺艾黎85寿辰。

前 言

路易·艾黎是中国人民最为熟知的国际友人之一。他1897年12月出生在新西兰，1927年4月来到中国，参与中国革命，创办工业合作社，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贡献。新中国诞生以后，他一直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亲眼见证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赢得的成就。1987年12月不幸逝世，享年90岁。今年是路易·艾黎诞辰110周年，中国人民将隆重纪念这位国际主义战士，在革命与战争、和平和发展的年代一直和我们同甘共苦、并肩战斗的伟大朋友。

乔治·何克也是中国人民的忠实朋友之一，只是因为逝世过早而不怎么为人们知晓。他1915年出生在英国，1937年来到中国，开始从事新闻工作，后来加入路易·艾黎所创办的“工合”事业。1945年因意外负伤而不治身亡，终年只有30岁。他的人生非常短暂，却参加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全过程，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奉献出一切。在纪念路易·艾黎诞辰110周年之际，我们自然也回忆起乔治·何克，向这位国际主义战士奉上我们真诚的缅怀和纪念。

现在读者朋友看到的这本《鲜花献给您》，是由聂广淳四兄弟为纪念路易·艾黎和乔治·何克而共同撰写的。他们四兄弟在抗日战争期间年纪还很幼小，与父亲失散后，母亲因病故去，他们陷入无依无靠的困境，是乔治·何克和路易·艾黎先后收养了他们。这两位外国人和他们非亲非故，只是因为和他们的父亲有过一面之识，基于共同的革命理想，就毅然代他们远离的亲人承担起做父亲的责任，在极为困难的物质条件下，尽力抚养他们成人。四兄弟因此而在著名的山丹国际培黎学校中得到宝贵的人生教育，最终走上革命的道路。聂广淳四兄弟讲述的人生故事，以伟大的国际主义之爱为主题，施爱者大公无私，不求回报，即使牺牲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受爱者则从感激中体会到责任，愿意用毕生的奋斗做出报答。这种爱的传递不是在同一个国度的人们中间，但其炽烈的程度却胜过父子、母子、兄弟、姐妹和同胞、同族、同乡、同行，真正实践了历史上的圣贤所推崇的四海一家的理想。

由于时光飞逝，这一段历史离我们日渐遥远。乔治·何克长眠在中国甘肃省的山丹已经六十多年，路易·艾黎在北京病逝将满20周年，聂广淳四兄弟也都进入了老年。无论中国和世界都发生了异常深刻的变化。与当

年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下形成的路易·艾黎、乔治·何克及聂广淳四兄弟之间的收养关系不同，有不少外国人到中国来认养孤儿，形成新型的国际家庭。这当中有许多具有新时代特征的历史佳话，也是沟通不同国家人民友谊的伟大的爱。我们希望人们不要因为年代的久远而把路易·艾黎、乔治·何克及聂广淳兄弟的这段刻骨铭心的历史遗忘，实际上，这种特殊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伟大的爱，与所有的人类之爱一样，具有永恒的意义。

我愿意反复地说明：聂广淳兄弟这本《鲜花献给您》是20世纪中国人民走过的战胜苦难的伟大道路的具体写照，体现出两位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对中国人民寄托的深切同情，也表达了中国人民对帮助过自己的国际友人怀着永远不会磨灭的感激之情。对从事国际之间人民友好事业的人们来说，这本书真实地刻画出我们不懈追求的最高境界。我相信我们可以从这本书中得到极为宝贵的启示。我们将坚持自己的理想，坚持自己的实践，与各国朋友携手前进，不断发扬光大伟大的人类之爱，共同走向世界进步人类团结友爱的美好明天。

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

陳昊蘇

2007年7月7日

目 录

前言·····	陈昊苏	(1)
路易·艾黎生平·····		(1)
乔治·何克生平·····		(4)
我们四兄弟的两位异国父亲·····	聂广淳	(5)
培黎学校是我家·····	聂广涛	(32)
艾黎爱山丹·····	聂广涛	(51)
把最有价值的东西献给人民·····	聂 劼	(56)
挽住逝去的岁月·····	聂广沛	(58)
遗产·····	聂广涛	(68)
山丹行·····	聂亮亮	(70)
高尚的品德 杰出的一生——我心目中的艾黎 ·····	聂亮亮	(81)
踏访艾黎故乡·····	聂广涛	(100)
怀念我的养父乔治·何克·····	聂广沛	(102)
来自英国的乔治·何克·····	聂亮亮	(104)
共同理想 保卫和平 ——艾黎、何克与我们的父亲聂长林的战斗情谊 ·····	聂广洪等	(114)
附录：		
山丹：为未来培养人才——《艾黎自传》节选 ·····	路易·艾黎	(130)
我收养了四个儿子——《从牛津到山丹》节选 ·····	路易·艾黎	(169)

路易·艾黎生平

路易·艾黎，1897年12月2日生于新西兰坎特伯雷地区斯普林菲尔德镇。祖父是南爱尔兰移民，父亲是小学校长，母亲积极参加争取妇女权利的运动。艾黎有兄弟姊妹七人，自幼受到严格的家庭教育和性格锻炼。1916年末，他中学未毕业便参加新西兰远征军赴欧作战，曾两次负伤并荣获军功章。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回国，与人合作办牧场。

艾黎从1927年至1938年在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消防处任防火督察、工业督察长等职。在此期间，他目睹了许多社会不平等的现象和中国工人遭受剥削和压迫的悲惨情景。反动统治者对人民群众的残暴镇压，更促使他决心投入中国人民变革社会的斗争。1934年他参加了第一个国际性的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并和中国共产党建立了联系。他在愚园路的住所成为党的地下工作者碰头的地点和避难所，上海地下党曾在他住所的顶楼架设过秘密电台。他还和史沫特莱、刘鼎等多方设法为红军购买医疗器械和药品。1936年西安事变前夕，他冒险去太原，为中国共产党兑换红军在陕西缴获的地方钞票。美国友人格兰尼奇夫妇主办进步英文刊物《中国呼声》期间，他是积极的支持者和撰稿人。他与当时文化界左翼人士鲁迅、茅盾、丁玲、胡愈之等也有接触。

1929年夏，绥远遭旱灾，艾黎利用假期去萨拉奇帮助华洋义赈会组织修建民生渠的工作。1932年假期，他又去湖北进行水灾救济工作，为洪湖老解放区抗洪人民运送救济粮。他还在节假日广泛旅行，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和社会问题。

1938年初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艾黎与埃德加·斯诺和佩格·斯诺等中外友人发起“工合”运动，制定了在非敌占区建立工业合作社的计划，以此支援抗战。这项计划从一开始便得到宋庆龄和中国共产党的支持。5月，艾黎辞去在上海的职务去武汉；8月，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成立。国民党政府迫于形势，不得不表面上支持“工合”，任命艾黎为行政院咨询“工合”工作的技术顾问。1939年1月，中国工业合作社国际促进委员会（简称“工合国际委员会”）在香港成立，艾黎为委员，并担任实地工作秘书。曾先后去菲律宾、缅甸、新加坡等地为“工合”筹募资金。

1939年至1942年期间，艾黎全力投入“工合”工作，经常奔走于中国

西北、川康、滇黔、湘桂、赣闽粤、浙皖、晋豫等抗战后方的城镇农村，组织和发展当地的工业合作社，在陕甘宁边区的延安、新四军根据地中心的茂林都设有“工合”事务所。艾黎为支援八路军、新四军抗日和向前线临时工厂输送技工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1939年至1940年，艾黎两次到延安，毛泽东曾予接见。1939年毛泽东和叶挺同志分别写信给“工合”国际委员会，高度赞扬了“工合”运动对抗战作出的贡献。据统计，截至1942年，“工合”在整个非敌占区总计建立了约两千个大小不同的合作社和作坊，生产数十种民用消费品和部分军需品。由于“工合”积极支持抗日，许多领导人和社员遭到迫害，国民党指责艾黎与共产党有联系，于1942年9月解除了他的行政院技术顾问的职务。

1942年以后，艾黎转向培训“工合”管理和技术干部的工作，同英国记者乔治·何克在陕西双石铺创办了培黎工艺学校。1944年该校迁到甘肃省山丹县，一度发展到近600人的规模，设有近20个供学生实习的生产组，实行半工半读、理论结合实际的教学方针，深受当地群众的欢迎。1949年解放大西北时，艾黎调拨学校所有卡车，帮助运送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为解放玉门等地作出了贡献，受到彭德怀同志的高度赞赏。1953年，学校迁往兰州，改名兰州培黎石油技工学校，艾黎为名誉校长。多年来该校为中国的石油和工业战线培养了许多技术人才。

1952年艾黎来北京参加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被选为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联络委员会委员。1953年定居北京，此后曾多次参加国际和平会议。1961年至1965年他每年出席日本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1960年、1965年、1971年，他三次返回新西兰探亲。1973年访问澳大利亚。在探亲 and 访问期间，他在各地多次作报告介绍中国。艾黎还先后去朝鲜、越南、蒙古和古巴等国访问。

新中国成立后至1985年，艾黎主要从事写作。他每年都要到各地参观访问，掌握第一手材料，用客观报道和新旧对比的方式，宣传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他写下了大量诗文，还翻译了不少中国优秀的古诗和现代诗，已出版的著作和译作共66本，他最后一本著作是《艾黎自传》。从这些作品中可以看出，艾黎对中国社会有深刻的了解，学识广博，对中国人们的事业有坚定的信念，对老一辈革命家感情很深。1978年以后他不断就中国的环境保护、经济建设、资源和青年思想教育、就业等问题提出意见与建议，力求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继续作出贡献。

为了帮助大西北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他将自己收藏的3700多件文物捐给山丹县，1982年起在新建的艾黎捐赠文物陈列馆展出。1984年他又促成山丹县培黎图书馆的建立，并捐赠了许多图书。1987年4月，他长期努力重建的山丹培黎农林牧学校正式开学，他任名誉校长。为募集学校所需的资金、设备，他在国际上做了大量工作。这项计划受到甘肃省政府的全力支持，新西兰政府、人民和各国友人也给予了热情的帮助。

艾黎晚年还为恢复“工合”进行了不懈的努力。1983年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恢复，艾黎被推选为名誉顾问。1987年，中断工作35年的“工合”国际委员会也重新组建，艾黎任主席，亲自领导了该会的日常工作。

在中国的60年，无论在国内革命和抗战的艰苦岁月里，还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艾黎总是坚定不移地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把全部心血和精力献给了中国人民的事业，受到中国人民、新西兰人民和其他国家人民的尊敬和爱戴。中共中央领导同志曾多次会见他。1963年艾黎生日时，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曾到他的住所祝贺；1971年毛主席接见了斯诺和艾黎；1977年邓小平同志出席了他80寿辰的宴会，称他是中国人民的一位“老战士、老朋友、老同志”，给予很高的评价；1987年艾黎90寿辰时，党和国家有关领导亲临其住所祝贺。

艾黎近年来在中国和新西兰获得了多种荣誉。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曾授予他文学荣誉博士学位；在他85岁和88岁寿辰时分别获得北京市荣誉市民和甘肃省荣誉公民称号；同年新西兰政府授予他“女王社会服务勋章”。近年来，介绍艾黎生平的传记和纪录片、电视片在中国与新西兰陆续发行和放映。

艾黎终身未婚，但收养了一些贫苦百姓和革命者的后代，晚年享受着四代大家庭的欢乐。

艾黎于1987年12月27日因患脑血栓并发心功能衰竭，经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终年90岁。遵照他的遗嘱，他的骨灰撒在他的第二故乡甘肃省山丹县。

乔治·何克生平

乔治·何克，1915年生于英国的哈本登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幼时曾在瑞士上学，1937年毕业于牛津大学，获文学学士学位。后离开英国作环球旅行，游历过欧洲，去过日本。

1938年初，乔治·何克抵达上海，决定留华观察中国社会。

1938年夏，经美国友人史沫特莱介绍，他在武汉结识了“工合”创办人路易·艾黎。之后，他以美国合众社记者身份，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安排下，去晋察冀边区采访，访问了八路军根据地和延安，会见了朱德和聂荣臻同志，被中国革命的精神所鼓舞。他从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身上看到了中国的希望。他不断以激扬的文字，向世界宣传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著有《我看到了新中国 (I see a new China)》一书，热情报道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的真实情况。该书于1944年在美国和英国出版。

1939年，何克去陕西宝鸡，在“工合”西北办事处任秘书、视察员，协助艾黎开展“工合”运动。

1941年，艾黎推荐他任陕西双石铺培黎工艺学校校长。他治校有方，以身作则，艰苦奋斗，被全体师生和当地百姓视如亲人。他还以国际主义情怀收养了中共地下党员遗失在宝鸡的四个幼子，和艾黎一起组成了一个特殊的国际家庭，与中国人民结下了永久的亲情。

1945年夏，在主持甘肃山丹培黎工艺学校工作期间，何克意外受伤，因患破伤风不幸逝世，时年仅30岁。

为纪念何克，艾黎于1981年写了《从牛津到山丹》一书。如艾黎书中所说：“在八年抗战的漫长岁月里，对于乔治·何克来说是度过了整整的一生。由中国革命的鲜血和激情浇灌的一棵幼小的树苗，长成了坚实的大树……他是出于对中国革命的信念而捐躯的……他是英国人民和中国人民之间的纽带，他的英名永存。”

甘肃省山丹县于1984年建立了乔治·何克图书馆，王震将军为图书馆题词：“学习何克先生的国际主义献身精神，发扬培黎学校的优良传统。”

我们四兄弟的两位异国父亲

聂广淳

我从1950年2月由山丹培黎学校回东北故乡后，至今一直从事技术工作。关于乔治·何克和路易·艾黎收养我们聂家四兄弟的情况，我很早就想把它写出来，可是，每次动笔都激动不已，情不自禁，热泪盈眶，千言万语不知从何写起，所以至今也未完成，感到万分内疚。

我们四兄弟的第一个养父何克已经离开我们近62年了，第二个养父艾黎也



四兄弟和艾黎在一起。

离开我们20年了。回忆往事，就像发生在昨天，我们的两位异国父亲的音容笑貌仍历历在目，和他们生活在一起的时光，我们是永远也无法忘怀的。



乔治·何克（1915-1945）。

乔治·何克是英国人，路易·艾黎是新西兰人，我们聂家共四兄弟。1941年，何克把我和二弟送入双石铺培黎学校。我母亲去世后，他又把三弟、四弟接至学校。1945年7月，乔治·何克因患破伤风不幸去世，抚养我们兄弟的重担便落在路易·艾黎肩头。

提到我们的异国父亲，就要先谈谈我们的生父聂长林。他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九·一八”事变后，在东北曾参加过杨靖宇将军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进行抗日活动。在抗日战争时期，受党的派遣在教育界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宣传抗日救亡，在敌后发展“工合”事业，支援抗战。1942年父亲调往延安工作，因工作成绩显著，1944年出席了中共中央直属机关群英大会，被评为特等模范工作者。在解放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父亲从事财经工作，曾任辽宁省计划委员会主任等职。

1940年底，我父亲在“工合”西北区办事处开办的“工合”小学任教。宝鸡国民党当局通缉共产党，情况危急。中共宝鸡县委书记王明哲主持会议，研究决定，派父亲到晋东南“工合”事务所工作，那里比宝鸡相对安全些。与他同行的有任立之、柳文等人。当时，我们家境窘迫，母亲有较严重

的胃病，她拖着病体靠纺羊毛线来养活四个儿子。我是家中老大，12岁了，二弟广涵9岁，三弟广涛4岁，四弟广沛只有一岁半。家中只有一些苞米碴子。但父亲为了革命工作，已顾不了这个家，毅然离家远走。父亲这一走，就再也没看见我们的妈妈，我们也是10年后才再次见到父亲。关于当时家中的情况，父亲在1976年给我们的信中是这样描述的：

“……我出得大门来，回头和你妈妈握手道别时，清楚地看到房东门口贴的挽联上‘一别永别’这个词时，已不能正视你妈妈的面孔了，转过身来虎跃龙飞似的头也没回。自那时起，我真的同她一别永别了！我什么时候想起这段情景，什么时候热泪夺眶而下……她特别忧虑我处在敌后斗争的生死攸关的革命环境中，而我又担心她内无生活来源，外无亲友资助，一群嗷嗷待哺的孩子，她又身患重病，一天吃不上一顿饭或一天吃不着一碗，这样的环境下，什么人能活下去呢？”

父亲在洛阳“工合”晋豫区办事处等候“过河证”时，结识了一位英国人，他就是乔治·何克。当何克得知我父亲为奔赴抗日前线弃家出走时，深深地为我父亲这种无私无畏的精神所感动。他对父亲说：“我就要去宝鸡‘工合’工作，我将全力照顾你家的生活。”

1941年5月，父亲已走了近半年。一天，宝鸡永清堡第二军毯合作社社长李维周（中共党员）到我家中告诉我妈妈说：“英国人乔治·何克寻找你们多日了，总算找到了你们的下落。”还说：“他是老聂的朋友，要领两个大孩子到双石铺上学。”妈妈听后十分高兴，当即为我和二弟整理行装。当天李维周老师就用自行车推着行李送我们去宝鸡“工合”西北区办事处。在那里，我们兄弟俩第一次见到乔治·何克。

他高高的个子，黄头发、蓝眼睛、白皮肤，中国话说得很好。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穿着一条有背带的中式工人裤，围着一条墨绿色的毛围脖。

乔治·何克是“工合”西北区办事处的视察员，曾在山西同八路军一道工作过。他对八路军很钦佩，且自愿以八路军的实干精神做些实际工作。“工合”西北区办事处妇女部便委派他负责到双石铺重建培黎学校（该校由妇女部领导）。何克由洛阳回到宝鸡后，就向“工合”社员打听我家的情况。他得知一个病妈妈领着四个孩子艰苦度日时，决定将两个大孩子送到双石铺培黎学校。这样一来可减轻我妈妈的经济负担，二来可使我们学习文化知识，受到技术训练。

何克见到我和二弟后，问我们愿意不愿意去上学，我俩同声说：“愿意

去！”他又说：“我认识你们的父亲，他是一个爱人的人啊！”何克和蔼可亲，平易近人，我们虽然初次见到何克，但并不因为他是外国人而怕他。何克初次见到我们兄弟俩，也非常喜欢我们。在宝鸡逗留期间，带我们去看电影。他工作很忙，也很认真，每天都要坐在打字机旁“噼噼啪啪”地打字。

由宝鸡去双石铺的交通很不方便，客车很少，去双石铺需要乘坐运货的卡车。司机过了检查站，可以私自带客，客人称为“黄鱼”。5月的一天，何克领我和二弟从宝鸡乘马车到益门镇，走过了“检查站”后，在公路旁边等汽车。何克坐在行李上看书，我和二弟在路边的野菜地里玩耍。地里长满了蒲公英，有的已经开了黄色的小花朵，我和二弟采了许多拿在手里。何克问我们这是什么花，我们说：“这是野菜。”何克又问：“能吃吗？”我俩同声说：“能吃！我们在家常吃这种菜呢！”何克接过蒲公英，认真地尝了尝，半天没说话，只是坐在那里，用深深的蓝眼睛许久地望着我们……

过了一会儿，来了一辆运布匹的福特牌大卡车，何克招招手，那车停了下来。他和司机接洽交钱后，我们三人都上了汽车。风较大，何克便把那绿色的毛围脖给二弟围上。汽车越过秦岭到达黄牛铺，我们吃了些东西，然后直达双石铺。宝鸡到双石铺虽然只有一百多公里，但足足颠簸了四个小时。

到了双石铺，我们看见了在一条河对岸的山坡上有三间房舍，这便是艾黎命名的喻义“为黎明而培训”的“培黎”学校了。它只有三间校舍，条件是那样的简陋。不久，我就知道这三间房舍有很大作用。这里既是学校也是艾黎的住所，是艾黎根据红军朋友的建议发展起来的。中间是大教室，左边是学生宿舍，右边是老师宿舍。当时，培黎学校只有15名学生，两位老师。学校的生产工具仅仅是木制织布机一台和绕纱机一架。学纺织的同学，就用织布机学织布；学机械的同学需到双石铺镇上的机器生产合作社去实习，然而在那里除了洒水、扫地、擦机器外，机床也不让摸一下。总之，当时学校除了三间校舍外，几乎什么都没有。领我们来的乔治·何克已是培黎的第九任校长了，其他八位则因学校简陋和工作操劳辛苦相继弃职而去。

自何克到校后，学校的面貌一天天很快地发生变化。先后从宝鸡、河南、四川等地来了几批学生，还招收了流亡到当地的难童，请来了教机械学的教师丁齐生。他教授的机械制图，让学机械的学生对这门课着了迷。

路易·艾黎和乔治·何克经常在一起探讨教学方针和办学方向。艾黎非常欣赏培黎学校这位年轻的校长。他们一起学习了马克思关于教育问题的阐述：“未来教育对所有已满一定年龄的儿童来说，就是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

育相结合，它不仅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艾黎和何克就是按照马克思的这个论点，坚定不移，身体力行地创办培黎学校的。理论联系实际，手脑并用，创造分析是学校的教学宗旨。他们感到中国的广阔农村需要改造，沙漠需要治理，荒山需要开发，河流需要利用。他们满怀信心地培养适应广大农村需要的技术人才，培养学生具有自力更生的精神和坚韧倔强的性格，从而靠自己的双手和创新精神创造幸福的未来。

过了不久，柴油机运至学校，同时还运来一台车床。乔治·何克亲自领导机械组的同学安装。从此，机械组便有了自己的实习场所。何克又带领同学和工人烧石灰、伐木材、烧砖，并在公路旁的小河边上修水渠、安水轮机、盖棉纺厂厂房……拥有了并条机、粗纱机、细纱机等一整套棉纺机器。学生人数逐渐增多，乔治·何克便把自己住的房子倒出来，他搬到亲自参加挖掘的窑洞中住，窑洞便也成了学校的活动中心，医务室也设在那里。为了解决同学吃菜难的问题，何克领着大家在桥头庄开辟了蔬菜种植园，盖了两间房。厨师经常去菜园摘菜。园中原有的几棵大柿树，全部得到了精心护养。秋天柿子熟了，摘下来储存在大缸里。学校学生统一着装，冬天是帆布棉衣，夏季则是衫衣短裤。师生们团结和睦，组成了一个愉快的大家庭。每天早晨起床后，乔治·何克带头跑步到河边去洗脸刷牙，夏季每天中午领大家到河里游泳一个小时。学生们个个晒得脸庞红里透黑，身体结结实实。

我和二弟入校后，我妈妈的病情逐渐加重。宝鸡永清堡纺毛站的刘志仁曾先后给我们来过信，信中多次提到妈妈病重的情形，但我们年龄较小，缺乏经验，没有引起重视。1942年夏天，乔治·何克交给我100元钱，让我兄弟俩回去看望妈妈。我们心中都十分高兴。回到家中，我们看到妈妈身体比一年前差多了，很瘦弱，两个小弟弟在那里缠毛线球，我们是悲喜交加呀！最后我俩失声痛哭。妈妈安抚我们说：“我的病不要紧，你们不要哭。你们的何校长真是个大好人哪！要不他是不会帮助咱家的。一个外国人能帮助咱这样穷人家，实在是难得呀！等你爸爸回来让他到学校好好地谢谢何校长。”我们在家待了几天，要返校时，妈妈拖着沉重的步伐，领着三弟、四弟，一直送我们到堡子门外，眼望着我兄弟俩远去，当我回头看她时，她还在那儿远远地招手……

不久，妈妈病重，已经不能自理，更不用说要拉扯两个孩子。如果不及时治疗，后果是很难想象的。何克深知妈妈的处境，8月的一天，他叫我同他

一起到我家去看看。到宝鸡后，我自己先回家，我看到妈妈更瘦了，而且被病痛折磨得不像我以前看见的妈妈了。两个小弟弟见到我，就一同抱住我的腿，他们也有些怕妈妈的样子。我也知道妈妈病得快不行了，我泪水满面。妈妈说：“广淳那，你和广涵都上了学校，有吃有穿有书念，还能学本领，你俩不要辜负了何先生对你们的养育之恩啊！”她没有眼泪，精神也很好。我告诉她：“何先生来宝鸡了，他还要来咱家看你。”我返回宝鸡把家中的一切都告诉了何克。于是第二天早晨，我们一起到了永清堡。妈妈见到何克十分惊喜，但埋怨说：“你们为什么不早来一个月啊！我快要死了，你们来晚喽！”

何克见到我母亲病得不轻，不送医院恐怕就没命了，决定立即送她入院治疗。他从当地纺毛站借了一副担架，又雇了两个力工。何克亲自给妈妈收拾一番，帮她洗头、洗脚、换衣服。两个小弟弟衣服上的虱子他也给抓光了，又把衣服洗了。

而后，两个力工抬着担架，向宝鸡“工合”医院走去。这段路程有25公里，何克肩上扛着老四，我和三弟跟着走。一路上，我妈妈不愿躺在担架上，几次坐起来谈论着沿途的人和事，向抬担架的两个力工打听家世。她十分感激这个外国人能把她送到医院。两个力工走几里路，就需要休息一会儿，乔治·何克看他们太累，就亲自抬起担架的一端，另一端由两个力工轮换抬。何克抬着担架走了全路程的一半以上。当天傍晚，妈妈住进了宝鸡“工合”医院。在整洁卫生的病房里，她很满意。但是，经过一天的奔波劳顿，她的病情恶化了。她盘腿坐在病床上呻吟着，向乔治·何克说：“你把我送到这里来是白花力气和钱呀！我快要死了，我的孩子怎么办哪？你要他们吗？你把他们当自己的儿子吧！”何克向我妈妈担保，一切都会好的：“只要你不着急，一定会好起来的。”还说：“万一你有一不幸，你的儿子就是我的儿子，路易·艾黎还没有成家，这样是很方便的。”经何克这么一说，我妈妈宽慰很多，但她知道自己活不多长时间了……

妈妈入院后，何克和我把两个小弟弟寄养在华姨那里。华姨叫华绣珉，她丈夫鞠抗捷是中共党员，也在太岳山区。每逢周六，老三、老四去医院看望妈妈。那年年底，医院也没有挽留住妈妈的生命。但她的死没有告诉孩子们。一天，华姨到处找老三，说他丢了。可过了三天，他又回到了华姨身边，原来他偷偷回家找妈妈去了。华姨只好告诉妈妈不在了，从此我们都成了孤儿。

妈妈去世后，老三和老四被送进“战时儿童保育院”。夏天，何克领我